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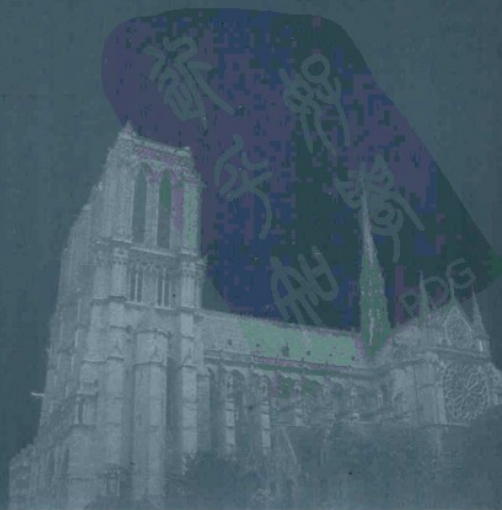
人文新视野·第六辑 New Perspectives in Humanities Vol. 6

主 编

史忠义 户思社 叶舒宪

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

*Stylistic Studies
Textual Theories*



人文新视野·第六辑
New Perspectives in Humanities Vol. 6

Stylistic Studies
Textual Theories

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

合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Cente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Center of European-Americ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X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主 编

史忠义 户思社 叶舒宪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格研究 文本理论/史忠义,户思社,叶舒宪主编.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6

(人文新视野·第六辑)

ISBN 978-7-81091-765-0

I. 风… II. 史… III. ①文学创作—风格(文艺)—研究
②文学理论—研究 IV. I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2364 号

责任编辑 何 新

责任校对 李利敏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93 千字

邮编:475001

网址:www.hupress.com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1.25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风格研究

莱奥·斯皮策与风格学解读

- (瑞士)斯塔罗宾斯基 著 史忠义 译(3)
- 拉伯雷与“拉伯雷学家们”..... (奥)莱奥·斯皮策 著 孙亭亭 译(26)
- 米歇尔·比托尔小说技巧的几个方面
- (奥)莱奥·斯皮策 著 杨玉平 译 张智庭 校(53)
- 关于伏尔泰的几点阐释..... (奥)莱奥·斯皮策 著 姜丹丹 译(96)
- 关于《玛丽亚娜的生活》..... (奥)莱奥·斯皮策 著 蒋梓骅 译(127)
-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风格..... (奥)莱奥·斯皮策 著 涂卫群 译(152)
- “巴黎的叫卖声”词源考..... (奥)莱奥·斯皮策 著 孙亭亭 译(229)
- 文学的突破——《审判》
- (奥)黑克尔·阿克塞尔 著 皇甫宜均 译 聂 军 译校(237)
- “自上而下”的“失败宿命”——《唐·卡洛斯》研究..... 叶 隽(264)

跨文化对话

何谓“跨文化态度”? (法)陈力川(289)

文本理论

- 文本理论..... (法)罗兰·巴特 著 史忠义 译(297)
- 文本与文本科学..... (法)朱丽娅·克里斯特瓦 著 史忠义 译(309)
- 文本与文体..... (日)齐藤兆史 著 张升余 译(324)

Contents (338)

风 格 研 究

Stylistic Studies

莱奥·斯皮策与风格学解读

(瑞士)斯塔罗宾斯基 著 史忠义 译

内容提要:这是日内瓦学派著名批评家斯塔罗宾斯基为斯皮策法文版文集《风格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文章全面总结并评述了斯皮策的风格研究方法及特点。

关键词:斯皮策 风格研究

莱奥·斯皮策(Leo Spitzer, 1887-1960)从语史学开始。本世纪初德国罗曼语学者们给了他早期教育。在他那里,一切都是从最初的有益知识出发,然后奇迹般地扩展的,这些知识使他熟悉了罗曼语系的演进机制。他的老师迈尔-吕博克(Meyer-Lübke, 1861-1936)为他树立了系统、合理掌握言语材料的楷模;他可以以同样的精神持之以恒于历史语法、词源学和词汇学。他可以像贤师们那样,施展某种无限的洞察力,把演进语言学成就为一门正规学科。

斯皮策幸遇良师。成功教育的真谛,就在于引发优秀学生的智力解放,引发他带着接受的知识,奔向陌生的处女地。在《语言学与文学史》(*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1948)一书序言中描画自己学术生涯的阶段时,斯皮策回顾了面对迈尔-吕博克“实证主义的”谨慎态度时他的不满之情和逆反心理,在他看来,迈尔-吕博克的著作关涉法语的史前史,而与它生动的发展史无关;逆反心理随后集中在文学史家们那些瞻前顾后的研究方面,斯皮策以为,它们因为竭力回避作品的活力,沉迷于相关问题、次要细节和无足轻重的注释而贻误读者。

即使在语音变化的研究方面,斯皮策也无法满足于整个言语科学几乎一致赋予重要地位的机械规律。他偏爱胡戈·舒哈特(Hugo Schuchardt, 1842-1927)的思想,后者坚定地反对“机械主义”,并为论证有据的词源学和日常创新辩护。(斯皮策1922年发表了《胡戈·舒哈特手册与普通语言学教程》[*Hugo Schuchardt-Brevier. Ein Vademecum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一书)富有揭示意义的选择:它把斯皮策置于这样一些学者的阵营,他们并不彻底否定言语内在规律的存在,但优先关注表达的变化,寻觅说话者动机指向的痕迹。此即透过新词新义、变形,透过前所未有的句法结构,竭力与说话主体(个人或集体)对接。因此,把斯皮策的思想与从言语中追寻时代或人民天赋之区别性标志的浪漫主义语言学家们的思想联系起来并非不可能;我们还要补充说,通过实证调查和规律的系统化探索,斯皮策不啻上溯到了语言科学的源头本身。因为,正是他身上的叛逆性事实上拉近了他与学科创立者,如迪茨(Diez)和格林(Grimm)等学者的距离。

比任何人都更擅长挖掘语言形态本身和演变线索的斯皮策,很快转向经常不稳定的不规则现象,这些现象中显示着个体对所占有语言资源的独特使用。激情、需要和生活目的引起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是瞬间的,仅与说话者个人相关联,有时则是持久的,并很快融入共同语言。那么,重要的是,又能发现这些变化并“诊断”出它所蕴涵的意义——在诊断中竭力确定造成变化的精神行为。这样,变化就被当做一种标志:真正的言语知识(即回答变化如何产生的问题)就只有工具价值并从属于变化为何发生的问题。我们在费迪南·德·索绪尔的一个日内瓦学生查尔斯·巴伊(Charles Bally)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的关注。^①然而,当巴伊从“语言现象”(“faits de langue”),即从居民群体为回答生活境遇而不具名创造的陈述方式中研究言语的生命时,斯皮策则试图深入到研究“话语现象”(“faits de parole”),深入到检视体现作家独特个性的偏转和独特风格中去。他从来没有停下同时在共同表达领域(即索绪尔所谓的“faits de langue”,斯皮策本人所谓的“*Sprachstile*”)调查的脚步,但把自己的基本研究投放在创作者引入自己个体语言的“表达体系”方面(即索绪尔所说的“faits de parole”,斯皮策则把一个德语复合词颠倒为“*Stilsprachen*”以示区别;我们应当从法语中找到这种对立的相应表达方式:作为权宜之策,*Stilsprachen*就变成“le langage du particulier”[个体言语],而*Sprachstile*则变成“particularités de langage”[言语的独特性])。

语言学向应用于文学作品的风格学提供它的资源。我们注意到,斯皮策的第一部作品是关于拉伯雷的语词创造的一篇长篇论文,作为新词新义之风格学价值的例证(《以拉伯雷为例说明作为修辞学手段的词汇建构》[*Die Wortbildung als stilistisches Mittel exemplifiziert an Rabelais*],哈雷,1910)。这个主题和标题都富有揭示意义,因为我们从中看到,斯皮策触及了

① 请特别参阅《普通语言学及法语语言学》(*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t linguistique française*)一书,第4版,伯尔尼,1965。

语言学的一个传统问题,即词的构成(*Wortbildung*),但是把构成功能从语言转移给了作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自己的注意力瞄准一位罕见的创造新语词的作家。这里,“新词新义的引入和使用”可以指称一个人,甚至可以归诸一项审美计划:从真实材料出发令人头晕目眩地生产某种非真实。由此,拷问语言现象之动因就不再仅出于某种合情合理的好奇心,而是一种揭示动机、目的、组织能力的必要的步骤。批评家观察到的异彩纷呈的现象,可以归结为某种统一的动机(某种“精神”,某种“气质”)。从语言学向文学认识的过渡就如此展开:语言在其变为文学的程序中被捕捉,在其运动中,在其被作品化、被“滥用”的过程中被捕捉;反之,文学是从其言语材料,从其文本风貌中被触及的。如果说文学的认识过程不啻于重温发生学的过程,其旅程却因作品中使用的语词和形式的整个“背景史”而大大延长,为意义构成作出贡献的所有“材料”关系也丰富了对作品的理解。

文学作品的风格学只是希望把自己的能力用于实践的语言学的诸种方向之一。如果简单地把斯皮策看做语史学的叛逆者,看做转向大作家的“批评研究”,我的意思是说,转向某种更高形式的文本解读,那等于错误地理解了斯皮策。斯皮策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纯语言学。纯语言学始终是他的核心战略阵地,是某种知识源泉。正因为纯语言学具有这种功效,在他看来,它不应囿限于学科划分为其分配的专业化界限。作为与意义相关的形式科学的语言学,具有解释学的禀赋,凡有言语需要解读、意义需要破译的地方,都普遍欢迎它的参与。由于风尚的帮助,法语读者对于如今把各种各样之文本建构——意识形态类、社会体制类、广告类等文本建构,都置于语言学类型之解读的种种举措,不再陌生。但是,一般而言,他不知道这种尝试并非新举措,探索早已开始,诚然,起始的基础与如今的结构语言学不同。斯皮策乃开路先锋之一,他于1948年即把风格学解读的技术应用于美国的广告语言(被视为一种大众艺术)。不管斯皮策在众多论文中赋予说话者个人主体,即赋予艺术家的地位多么重要,太关注普遍问题的嗜好使他无法割舍对言语其他用途的挖掘。语言学作为一般批评的工具,应该被用于各种方向,用于留下说话者(思考者、想象者、幻想者、写作者、聆听者)痕迹的所有地方。代表作的风格学只是这种知识的一种应用——无疑是一种优先应用,后者不再囿限于某种谨慎的中性形态。如果我们自信拥有足以恰当掌控各种各样言语现象的阅读能力,其他宗旨就不会不浮现出来。它取决于研究者根据所察觉之呼唤对其调查坐标的确定。这是一种原则决定,视文学作品为受制于某种特殊和谐的封闭组织。另一原则决定不再把作品个性化,而是竭力破解文化形态(并确定其具有揭示意义的语义场),或者再现一个语词的历史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思想史。

斯皮策实践了历史语义学(经常把它应用于共同语言从诗歌和哲学中吸收来的某些关键词),作为作品解释的对照性补充。《历史语义学论文集》(*Les Essays in Historical Semantics*, 纽约, 1948)——里边收有一篇研究“环境”(milieu)一词的优秀论文——对德语词 *Stimmung* 的哲学和语言学前辈的调查(《和谐世界的经典思想和基督教思想》[*Classical and Christian Ideas of World Harmony*], 1945, 1963 年结集出版),显示了不再以作品为对象,而是以思想潮流为对象的“语言学关注”的有效性。斯皮策曾经清楚地解释过风格学与历史语义学的互补性。《历史语义学论文集》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所收集的文章大概提供了《风格研究》(*Stilstudien*, 1928)的某种对应物……后来的主人公们是一个个作家,拙作从他们白纸黑字的话语,从他们独特的风格,研究他们的文学个性;而这里的主人公们则是语词本身,展现不同时代作者们如何使用它们的原貌;借用福斯勒(Vossler)创立之二分法,显然,这些语词应该从超越个人的角度去观照,而向这些语词留下印痕的个性只能是文明的个性,尽管毫无疑问,文明是由无数个人的个性构成和装扮的(然而,个人仅赋予其文明一般情感以某种表达方式)。”如果作家与文化环境互相依赖,那么风格学与历史语义学远非互相对立,而是互相支持。任何个人形式都是从某种集体背景中脱颖而出的,后者本身已经是形式的某种汇集。这样,我们终于可以更正确地理解文化事实,因为,在承认作品审美自主性,把作品当做一个完整世界拷问的同时,从另一角度,视它们为人类活动历史发展进程中之接受者和输出者的思路,也毫无不妥之处。作为共时审美结构之描述和共时关系之解读的风格学研究,很容易招致逃避历史的指责:不久以前,围绕结构主义的争论刚刚发生。对于斯皮策而言,历史到处都是隐晦的、暗含的、氛围性的:一部作品的形式永远都是从一定时期的材料开始获得的,而任何强势作品可以说都对历史产生影响,它既刻画它的历史时代,又受后者的刻画。在这方面,斯皮策本有可能受诱惑的驱使,建构某种系统的批评理论,把后者建立在某种文化哲学的基础之上。他不想把自己囚禁在这种牢笼之中,他更喜欢阐释的日常实践和巨大的好奇心激励他投身活生生的体验。他既反对知识分子的腼腆,又反对对方法走火入魔,而是用一种细腻精神驾驭他的实践。斯皮策没有把历史语义学与风格学之间的联系格式化,而是乐于维持它们之间丰富的往返关系。只要认真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风格研究从历史语义学中获益匪浅,另一方面,关于语词史研究的主要接力棒又主要活动在文学名著之间。兴之所至,他喜欢用争论的方式肯定自己的原则,或者批评缺乏历史信息

Lovejoy]一次值得纪念的争论中^①),当他认为后者过分沉迷于意义单位的语义区分、过于重视无名小作而无视代表作的审美价值时。

这种顽强的经验主义、执著地采用阅读灵感的精神以及与经典大作的持久接触,我以为并非某种实证主义立场的结果,而是气质流泻的效果,是这位风格学家个人风格的体现。与他的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们发现他深受生活活力的吸引:不管是面向作品,还是面向熟语或面向语词史,他的所有选择都旨在昭示鲜活的生命。他更喜欢从情感显现中挖掘共同言语,如从爱情语言中,从饥饿语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皮策在奥地利从事意大利战俘所投寄信件的工作^②)。他本能地寻找言语的活跃形式,寻找话语戏剧化的领域:在文学作品中,调动语词的欲望品性使它们获得了强化语义;而语词史上的每代人都侵犯言语遗产,因为新摩擦、新需要不断出现,新机构不断诞生。斯皮策的善意始终投向生命迹象,因此,他偏爱对统一原则的昭示。当他投身语义场的共时研究时,他并不寻求对差异体系的昭示(如同索绪尔理论可能向他建议的那样),恰恰相反,而是寻求某种聚合网。当德国人的历史精神(*Geistesgeschichte*)倾向于把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浓缩为一种“时代精神”(Zeitgeist),并视后者为该时代文化现象严格的公分母时,他对这样的历史精神不屑一顾,然而,相对于支离破碎的分析,他更偏爱统一性的理解。因此,他呼吁谈论一时代之趣味或精神的权利,条件是仅仅把该趣味或精神作为“一时代或一种运动各种不同特征之总和,历史学家竭力视其为某种整体”。从历史精神中,他希望保留整体要求,而非咬文嚼字和神话学倾向以及夸大其词的共性;他准备保留思想史的清晰理性和丰富博学,前提是不沉迷于概念区分的灰尘之中。他希望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每个语词、每个概念中,承认与其不可分割、密切关联的某种情感的存在。

对鲜活的这种趣味、揭示统一中心的这种欲望、这种阻止莱奥·斯皮策心安理得地囿限于纯语言学领域的焦躁心理,它们首先是一种个性的严格特征,然后才是某种方法的条款内容。人们预料会找到一个大学者,却发现了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此种情况不啻为一段佳话,却有违斯皮策的初衷;他太特别,太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而难以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反之,我从作者不可能

① “History of Ideas versus Reading of Poetry”, *Southern Review*, VI (1941), p. 584-609. “Geistesgeschichte vs. History of Ideas applied to Hitler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Ideas* V (1944), p. 191-203.

② *Die Umschreibungen des Begriffes “Hunger” im Italienischen*. 哈雷, 1921. (Beihefte zur 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 n°68.)

把自己禁锢在自己单一学科这一事实中,从他打破学科堤坝的豪情中,从把语言学家改造为风格学家,然后再造就为文学批评家和思想深邃的诗人的气势中,看到了某种榜样的东西。限制的威胁压迫着他,在他看来,永远要克服某种孤立状态,永远要有胜利而出的豪情,永远要寻求某种切入点。他的清醒、他的激情部分是因为他的圈外人处境,即某种原初距离,他善于利用这种原初距离以期更好地捋清那些熟视无睹者无法看清的结构和价值。距离成就了“旁观者清”,然而斯皮策同时把距离体验为需要填补的空间,体验为获得结合性成果需要克服的间隔。作为语言学家,他本来离诗最远,然而却处于破解诗歌进程并最终以更深切之理解投身其中的优越地位。他是奥地利籍犹太人,经典人文精神的学养很深,几乎可以以人种学家的视野接触罗曼语系文学,可是贴近作品的方法却像追求爱情一样。斯皮策在一篇论文的卷首引用了瓦莱里·拉尔博(Valéry Larbaud)的一句话,即“这种语言,我学习它就像获取一个女人的爱情一般”,不经意间提醒我们,他心目中的语史学很难摆脱爱情成分。在积极的耐心、勇敢的前行、战胜种种阻力、捕捉种种秘密之中,在关键公式的喷涌而出中,我们都可以从作品中看到阐释的情欲,把作品当做一个起先保持一定距离并具有自我防护意识的人看待。斯皮策描写任何事情都没有描写爱情——身体体验或神秘幻想——的话语流程那么自如绝不是偶然的事:在这些轻车熟路之处,阐释风格与阐释对象之风格被某种预先建立的和谐联系在一起。这里指出,斯皮策许多论文采取的好斗形式并非对上述爱情特色的否定,更多地是一种肯定。斯皮策需要挑逗才动笔:在他认为重要的某一点上,他人的错误是最有效的刺激之一。正如某位竞争者的出现挑动着许多恋者一样,斯皮策似乎希望他对有争议文本意义的攻克与对手的败北相吻合。总而言之,纠正一处误解、修正一个错解、与同行商榷,对他而言,等于从外围某点重新出发,等于把自己重新置于外围处境,由此可以向中心地带发起旨在取得胜利的攻势。有时甚至草草而就但目标坚定的许多论文之所以采取了高校论战的好斗姿态(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已经很诙谐地谈到“学术上的互相吞食”),绝非斯皮策热衷于语史学(或神学)那些恼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dans les petites choses de l'odium philologicum ou theologicum),而是他从争论中寻求某种原初动力:某位可以与其论争并谈论作品意义的学者。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回应。《关于〈玛丽亚娜的生活〉》(*La Vie de Marianne*)的论文足以说明问题:这是一封公开信,斯皮策友善地反驳了乔治·普莱(Georges Poulet,他在巴尔的摩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同事)的观点。另外,斯皮策通常用他所批评的对象的语言写作,这使他达到了多语种写作的惊人水平(他先后使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写作),但是这样并非没有

影响批评家自己的话语。斯皮策不想成为一个作家,所以他自己的言语对他而言并非很重要;在他看来,“博学”型评论家的功能既是相对的又是工具性的,面对庄严的作品是一定会消失的,然而如何更好地让人知道这一点呢?大概只有思想深邃的诗作,像任何伟大的史学家一样,斯皮策能够达到思想诗的高度;如果他的好斗性情稍微滞涩一点,他的报复情绪不那么流畅,那么他的思想诗作就一定更敏锐。

我可能给人以过分强调性情特征的印象:它们赋予斯皮策的作品以非常独特的格调和特征。它们不具有根本性质吗?斯皮策作品不连贯的、非体系性的、立体感极强的共象形态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是第一个吁请我们思考“形式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这一观点的人。上述性情特征乃是自原则起就追求多维的某种方法的构成部分。要求严格尊重事实、不懈关注文本性的同时,斯皮策不厌其烦地把某种“存在”份额纳入他的方法论。十分重视生活概念的斯皮策理论从自传性文本中获得最完整表述难道是偶然的吗?更明显的是,我们发现他从富有哲理和抒情色彩的警句中,试图用“关系”维度补充研究中的“实证”维度,他的“关系”维度不仅涉及与阐释性话语的对象之关系,而且涉及研究者与自我的关系。这里,我尝试着把斯皮策的一段**关键警句**(*Schlussaphorismen*)翻译出来,这段警句位于《罗曼风格与文学研究》(*Romanische Stil- und Literaturstudien*, 马堡, 1931)一书的结尾。我们将看到,批评家没有忘记弗·施莱格尔(F. Schlegel)的教导和浪漫主义的反讽意图:

今天,我只能把科学研究视为一项在多层次开展的活动。诚然,我不希望研究人员像指挥柏辽兹(Berlioz)《安魂曲》(*le Requiem*)必须向五个不同方向频频转动的音乐指挥那样。然而,任何活的东西证实,至少有五个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层面。真正的科学专业属于第一层面,在这一层面,研究者应该努力为知识领域某一尚且昏暗的部分带来光明;他应该昭明某种限定的真实的(*sachlich*)东西。第二层面仍然属于科学领域,在这一层面,他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丰富方法论(*die Methodik*)方面的实践:实证工作如果不引发任何方法论方面的思考,就不具备运动因素和超越因素,它们是任何真正的科学工作的真谛。

我们可以把下一个层面界定为哲学层面,在这个层面,研究者明确自己面向世界整体的立场:他的工作除去臣属目标的一面,还应该同时引起抒情高潮和形而上高潮,满足人的内在的精神需要,它应该给他带来类似于艺术作品给艺术家带来的解放一样。第四层面是人文和社会层面,在

这一层面,实证研究乃是与研究或友谊所确定所关联的对象的持续对话和讨论:研究既然以其为对象——舍勒(Scheler)不久前曾经批评过“无对象”的哲学!那么每行文字都应该有他的身影,都应该请他出场或引发他的反应。最后,我希望论文可谓写作于虚无之边缘,作者沉潜于知识之中,不受任何东西的干扰,富于自我批判和自卫精神,也许写作于整个躲避任何干扰的心态之中。唯有心无旁骛,论文才可能平实、论说有道,才可能具有伴随着任何可贵努力之高超隐身;应该接受死亡和“灭绝他者”的成分,没有它,鲜活就无以存在。如果著作想继作者之后继续生存,像子弹出膛或像星光一样散发火花,而非一块僵死的孤立的大理石,它就应该体现其创作者的斗争精神,把他的斗争意志传达给读者。

囊括研究材料的完整性(*Vollständigkeit*)不如人的态度的完整性更重要:知识领域的广度、方法的恰当性、通过科研对自我的形而上解放、内在对象的具体化、空灵意识,如果这五个要素之一缺席,那么,研究工作就不“完整”,它们就不具有必要性,对研究者本人而言,它们不是令人满意的。真正的研究者总是伴随着对象、某种超自然之真实、活生生的读者,并面向虚无。这意味着,他不是孤身一人。



斯皮策承认,他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是,变化没有影响他的基本思想。斯皮策的基本思想是:风格学应该填补文学史与语言学之间的空隙,并因此而使意指的一般科学服务于文学作品这个独特的表意体系。变化也没有影响所用手段,没有影响批评家为了风格解释而调动的工具类知识。然而,批评活动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为解释活动确定的宗旨发生了变化。

斯皮策风格学的第一种方式,是想重返心理真实,同时尽力确定某种“集体精神”。面对文本,斯皮策试图从中捕捉与作者灵魂相关的独特性格,但同时惦记着从一种文字的独特运动中,捕捉集体精神的表达标志或变化先兆。这样,假使一个作家的内在经验具有代表性或预示性,建立在风格分析基础之上的心理归纳就可以用于某种外推法,把前者的结果延伸到对某一历史时期,某种艺术氛围、道德氛围或社会氛围的界定中去。在斯皮策的精神里,任何心理风格学都应该继续拓宽为社会风格学。这里,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言语和文学创作的唯心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斯皮策的背后(他的朋友卡尔·福斯勒[Karl Vossler]的背后也一样),矗立着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高大身影,在他看来,言语作品(*ergon*)显示着属于言说者主体及其历史群体的内在力量(*energeia*)。因此,我们所接触的作品表达着某种心理活动,后者规定并造就着前者;作品这种**真实**(*Tatsache*)承载着某种**行为活动**(*Tathandlung*)的标记。在一种赋予说话者主体和表达行为如此优越地位的观念里,风格学就成了各种言语科学中的至高学科:只有它能够洞见话语行为所蕴涵的唯一和创造^①。众所周知,本世纪初叶,在意大利和德国,克罗齐(Croce)思想的影响何其大矣,他把语言本身也附属于一般美学领域,只考虑表达行为,把语言学“科学地”研究的所有内容,如音位学、语法学、句法学、符号学等,都缩小为依附性抽象功能。“重要的是,”克罗齐写道,“我们应该承认,言语唯一的**具体形式**,言语的唯一**真实**,是活的话语,是句子、时代、页面文字、诗段、诗,而非**化学符号般**(*per se*)孤立的语词,亦非孤立语词的机械汇集。”^②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是,克罗齐从斯皮策的成果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把它们看做是由自己当年植入土壤的小苗长成的绿荫大树:“今后当然只能把语言当做‘言语’,并因此而从说话者主体的精神状态了解它。”^③当斯皮策断言文本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作家灵魂的运动时,他只不过肯定了克罗齐把他纳入自己支持者行列的宣言。然而,实践中,事情的路径还是不同。人们势必已经发现,斯皮策通过其耐心的经验主义,通过他对笔法细节的极端关注、对文学工艺的尊重,总体上对话语材料很关心,而唯心主义学派并没有自觉地给予话语材料以这种关注,而是急于界定并评判精神“内容”。还应该提到的是,克罗齐后来对“所谓的风格批评”更多一些愤激之情,从达尼秋(d'Annunzio)、“纯诗”、神秘主义,总之,从颓废主义中寻找它的有害同伙^④。

“阅读法国现代小说时,我已经习惯于把我觉得明显远离通常用法的表达方式划出来。一旦把这些画线节段相比较,它们似乎经常提供某种相似性。我暗自思忖,是否可以建立所有这些偏离现象或至少大部分偏离现象的公分母。”斯皮策问自己,“难道我们不能找出这些偏离现象共同的精神源,找出它们的心理根源吗?”就像语言学家透过某语词家族分离出它们的词源之根那样。

① 见 Ernst Cassirer. *Die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1923, 第一部分, 第一章, § VII。

② “Sulla natura e l'ufficio della linguistica”, in *Lecture di Poeti*, 巴厘, 1950, 第 248 页。

③ *Conversazioni critiche. Serie terza*. 巴厘, 1942, 第 101-106 页。

④ “La cosiddetta critica stilistica”, in *Lecture di Poeti*, 巴厘, 1950, 第 284-294 页。

发现与一般用法的某种风格差异,评价该差异,论述其表达意义,使这一发现与作品格调和总的精神相一致,由此出发,更广泛地界定创作天赋的独特性格,并通过他,确定时代的趋向,这就是斯皮策式批评开始时为自己确定的路径。我们看到,如果说调查长时间地徜徉于作品内部,其抱负却是落脚在文学之外的人类现实上的。文学作品在普通用法、“一般语言”这种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彰显其特殊性。批评家拷问它,从中探寻可以揭示一颗个性“灵魂”的光亮;然后,作家的独特性又被解释为集体进程可包容的异变。他起初之所以独语,却是以全体的名义预言……对于早期的斯皮策而言,一切似乎都说明,风格上的差异、原初的偏离,乃是一种过渡(*transitoire*)现象,从预先存在的某种集体基础得到界定,又旨在在或长或短的期限内融入可普遍使用的言语资源的体积中去,即融入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之中。

真实地讲,对于关注文学知识之社会学延伸和心理学延伸的当今读者而言,我们刚刚谈到的批评程序的若干阶段有时显得稍许快了一些,且其构成亦有些随意和不慎重。斯皮策在确定风格特征时,善于以最细微之精心,创造新的概念,他发明了诸如“古典性弱化”(“*atténuation classique*”)、“弱音器效果”(“*effet de sourdine*”,“*klassische Dämpfung*”)、“似客观布局”(“*motivation pseudo-objective*”,谈论查尔斯-路易·菲利浦[Charles-Louis Philippe]时用语)、“神秘的略述”(“*raccourci mystique*”,评论 C.-F. 拉缪[C.-F. Ramuz]时用语)等令人称奇的正确术语。他让我们驻足观看综合性公式形成之前的全部车间工作,这些工作论证着后来的综合性公式。反之,当他落脚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时,我们经常感到他的思路有些倏忽而至。他有时稍显轻易地借用大众心理学的一般概念,或情感称谓,甚至还有时代类别的称谓。这一相对的弱点显示,在斯皮策看来,当一种风格之本质确定之后,基本工作即已完成。他需要超越这一界限吗?倘若风格已经得到全面界定,那么,界定者同时岂不也界定了向他提供风格信息的心理行为或心理能力吗?界定者难道不是已经指示出某种面对世界之态度,指示出某种社会现象吗?远非向心理学和社会学寻求某种援助,风格学难道无权在某种程度上取它们而代之吗?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斯皮策发现,没有必要对风格调查的结果做任何补充:只要忠实于唯心主义的前提,但凡它结束之处,都触及某种认识论界限。风格的综合公式自经验途径剥离而来,其整体难道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它是某种组织者“实体”)、具体性和特殊性(因为它是某一具体言语所独有)的巨大优点吗?需要补充的是,斯皮策的阅读是一种信任阅读。它原样(*at its face value*)使用文本,从中寻找并发现完整的心声。斯皮策从来没有为文本假设过某种遮蔽功能或神秘化功能。他从来没有想过,除了揭示功能之外,文本还有某种掩饰

能力；除了明白宣示的内容之外，文本还可能蕴涵其他东西，还可能包含某种潜在的补充内容。斯皮策的阐释只想从明白走向更明白。“风格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来自作者心灵”的警句可以完全颠倒为“作者心灵中没有任何东西不‘实现’于风格”。这一过程无其他可言；对于善观者而言，一切都可尽收眼底。我们不会在推断先前之动机、情感或社会经济基础方面发生失误。作品受某种内在原则的主导，可以通过其形式得到捕捉：一切都已昭示，没有任何隐含。在斯皮策的视野里，真正的风格现象学使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结论变成多余，它们都迫使文本交出阐释者千呼万唤的潜在信息。这并不是说“内心世界”的历史与心理没有区别，而是说，这些材料镌刻在不同的力量中心，风格学可以揭示它们。

风格差别概念的确体现了一种丰富的思想，其丰富性根据引发问题的广度来衡量。（我们离萨特在《方法问题》[*Questions de Méthode*]中针对“差异”概念的看法已经不太远了。）第一个问题与斯皮策宣称的在差别的个人意指与其历史标志价值之间展开的体现（la traduction）问题相关联。其设想可谓乐观主义的：表示个人与其环境发生冲突的差异性偏离，封闭为历史进步之梯度。一作家与世界相对立的个人方式变成了他改造世界的方式（或者他告知我们世界改造的方式）。诚然，个人是在世界和历史中面对世界和历史时刻的，但是，体现活动之展开难道就没有遗漏？谁敢向我们保证，某作家的个人话语一定预告着某种进步或进程、它们很快又受到某种新用法的惩罚、今日之差别明天就会变成一般文化的某种特征呢？这种景象要求作品的成就及其迅速承认……反之，另有一些人“断言”：风格差别中最宝贵的，不是可以与共同语言相汇合、可以融汇于共同语言中的东西；当作家激发出一句针对大家的话语时，他不可能预先知道某种回应是否会吸纳它，他步入差别之途，一个人独自承担着不可修补之差别和持续分离的风险。如果任何强烈偏离的话语确实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某种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中，如果观察家一直有权依据时代及其冲突阐释这种偏离，那么，同样真实的是，在其主观性源头，自浪漫主义起，就产生了肯定个人经验之独特品质的欲望，这使他进入其夸张心态，超越任何共同“真理”的界限，赋予他本真性的光彩。被其差异激情挟裹而动的个性，不会同意自己的独特实质被“已经形成”的言语，被集体已经预先接受的普遍性习惯体系所损害。

“个性是不可言传的”（*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经院派的格言如是说。就其极限而言，如果某人不满足于仅仅为共同言语添加一点个人色彩，他大概会选择沉默立场：语词似乎对他是禁止的。最大的差别即决裂、无法言说和“晦涩难懂”。此乃高傲的沉默，除非因疯癫而沉默。黑格尔认为酷爱纯正